



走向弱冠之年的王重民*

□顾晓光

摘要 文章梳理了王重民先生的家族简史及其少年、青年时期的经历,以及对此后学术道路的影响,并特别对王重民的原名进行订正,重点将其中学时代分成四个特点进行介绍和分析。

关键词 王重民 王鉴 新文化运动

分类号 K825.4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19.03.015

近期在孔夫子网上竞拍得到一部分王重民^①妻子刘脩业手写的王重民生平,内容主要记录他上大学前的经历。前两年曾听先生的哲嗣王平说,母亲刘脩业在晚年撰写过几万字甚至十万字的先生年谱,并请何兆武看过,还誊抄了一份。这份年谱让笔者念兹在兹,今终见一角。根据王平的回忆和刘脩业手稿以及晚年致傅振伦的书信看,这份年谱约写于1986~1991年。

此前关于王重民的研究较少涉及此手稿所示的阶段,且有部分内容与之前学者们普遍引用的资料相异,笔者认为有必要根据此手稿和北京大学图书馆信息管理系分馆所藏的王重民资料,专文对先生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②求学前的经历做一个梳理。王重民是民国时期成长起来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一生经历推翻帝制、新文化运动、国民大革命、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建设各个阶段。他有知识分子面对时局的共性特征,也有个性表达。同时,他一生中的各个阶段有着不同的思想和做法,既有一以贯之的,也有自我颠覆的。笔者也希望通过先生踏入学术之门前的经历进行梳理,分析其对个人学术研究所产生的影响。

1 家族简史

王重民生于今河北省高阳县西良淀村。祖上曾为大家族,有家庙和家谱,自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迁至此,村离高阳县城三十里。但传至先生祖父时,家势已渐式微,家谱散佚。祖父王继芳生于1841年,于清光绪初到附近任丘县的衙门任职,祖母刘氏。王重民出生时,祖父已回家务农,不再担任任何职务。祖父育有三子,长子王步霄,次子王步瀛,三子王步云。

长子王步霄为先生的父亲,生于1865年,喜读书且博闻强记,于1894年在保定古莲池书院考上秀才。因家境贫寒,故在村中开设私塾,同时爱看医书,自学成为中医大夫,并兼有一个小型药铺。由此,买了土地,雇了长工,家境向好。到1947年,共产党在老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运动时,王步霄有48亩土地,已不能参与劳动,被划为小地主成分。1949年后,先生的部分简历显示他的家庭成分为富农。

次子王步瀛育有二男一女,三子王步云育有二男二女。

先生的母亲名为王娟,育有二女二男。长女名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王重民全集》编纂”(编号:17ZDA296)的研究成果之一。

顾晓光, ORCID:0000-0001-9074-7930, 邮箱:gxxg@pku.edu.cn。

① 王重民(1903~1975年),字有三,曾用名王鉴。曾任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代馆长、副馆长,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今信息管理系)创始人,曾任系主任。我国知名的图书馆学教育家、文献学家、目录学家、敦煌学家。

② 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资料显示,王重民于1923年9月入学,1929年6月毕业,毕业成绩位列14位国文系毕业生第一名,80.8分。入学和毕业时间常被研究者引用错误,特此说明,并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肖亚女士提供的查阅帮助。



文,次女名考。先生排行老三,四弟王新民于1909年出生。

2 王重民原名正讹

以“王重民”为主题词检索中国知网(CNKI),最新一篇涉及王重民生平的文章是2018年第1期《书屋》的《功巨用弘 尽瘁公藏——近代图书馆学三大家》。里面介绍王重民为“原名鉴,后因受军阀通缉,取‘国家三宝,以民为贵’之意,改名重民,字有三,号冷庐”^[1]。

在王重民的简介中,大多持有这种观点,即原名鉴。在2003年纪念王重民诞辰100周年的官方介绍中也是如此。王重民的好友,同王重民并称陈垣门下“河北三雄”之一的傅振伦曾于1982年发表《王重民别传》,文中称王重民“字有三,原名鉴,……”^[2]。中华书局编辑崔文印所写的《王重民传略》^[3]和李墨所写的硕士论文《王重民年谱》^[4]都是持相同观点。刘脩业编写的王重民生平介绍和著述目录共有五份^[5],1992年出版的《冷庐文藪》为最后一个版本,只有此版本改为“曾化名鉴”,但并未得到业界的关注。由于夫人和好友都曾将王重民的原名弄错,学界直到现在介绍先生时大都采用这种观点。

在2013年出版的《版本目录学研究(第五辑)》中,艾俊川刊出了一封刘脩业于1989年4月8日致傅振伦的信件^[6],信中说:

王重民是他的原名。因我前年将发表在《图书馆学研究》1985年第5期上的《王重民教授生平及学术活动年表》寄予有三的弟弟及侄儿们阅读并请他们提意见,他们来信说“民”字是排行,有三的弟弟及堂弟名“新民、惠民、利民”等,所以重民是原名。后因在保定第六中学被直系军阀曹锟通缉,他被迫离婚避难,不久化名王鉴去六中复学,毕业后又恢复名重民。我以前因见有三在六中的笔记本署名“王鉴”,后考上大学在《学生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都用“王鉴”,误以为有三原名“王鉴”。

经过查阅刘脩业提到的王重民弟弟的家信,更加确定王重民为原名。在笔者手头刘脩业的手稿中,她同样更正了之前的观点,和致傅振伦的信件观点一致:

待通缉之事过后,重民化名王鉴字有三,又回保定第六中学上学,所取名“鉴”之意,用唐太宗李世民

语:“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朕尝保此三鉴”。至次年毕业时,他又恢复名重民,准备去北京投考大学。

但王重民在升入大学后,却以王鉴为名写了多篇评论性的文章,主要发表在《学生杂志》上。这时的“王鉴”成了王重民的笔名,所写文章与学术无关。

1926年7月出版的《东方杂志》第23卷第14期刊载的《〈道德经〉碑幢刻石考》和1926年12月出版的《图书馆学季刊》第1卷第4期刊载的《史记版本和参考书》均以王重民之名发表。而在同年12月出版的《学生杂志》第13卷第12期上发表的《论眼光》却是以王鉴之名发表。1927年,在《妇女》杂志第13卷第5号发表的《论我国古代的再嫁与离婚》虽是评论性的文章,但引经据典,颇具学术价值,并署名王重民。

这说明走入学术殿堂的王重民在学术之外的评论文章均不用本名,可能与不想暴露自己身份有关,比如他为了表达对于军阀的不满,称军人为“忘恩负义的丘八”,并且多篇文章充满了对传统社会和文化的批判。

另外,刘脩业在文稿中提到她在“文革”后将“刘修业”之名改为“刘脩业”。经询问王平,他对此并不清楚,但说母亲后来不喜欢“修”字。“脩”不仅是“修”的异体字,还有其他的意思,两者并不互通,笔者猜想刘脩业也许受了那个年代“斗私批修”造成全家劫难的影响而更名。

3 少年王重民

1910年,先生开蒙,开始识读《三字经》《千家诗》等读本。其母在他出生前曾经有一个早夭的男孩,所以对其极为宠爱,并取小名为“套”,意为将其套住。这使得先生从小脾气倔强,认准的事情会竭力坚持,虽已到上学年龄,但因娇养,他只在家里接受父亲的私塾教育。随着新式教育的出现和中华民国的建立,父亲开始考虑送他进入新式学堂学习。

1912年7月10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临时教育会议,由教育总长蔡元培报告开会缘由并演说。此为中华民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中央教育会议,会议持续至8月10日。7月16日,会议规定学制:小学校四年,高等小学三年,中学四年^[7]。1912年9月24日,教育部公布改正小学校名称令,改小学校为初等小学校^[8]。1912年9月28日,教育部公布小学校令,共47条。法令将小学校分为初等小学校和高



等小学校,初等小学校由城镇乡设立,高等小学校由县设立。满六岁的儿童应受初等小学校之教育^[9]。

1913年,先生到村小学读书,接受初等小学校教育。1916年自初等小学校毕业,考入高阳县县立高等小学。如果按照四年制初等小学校算,应为1917年毕业,但经过查看刘脩业手稿,得知先生在高等小学校读了三年,原因为村初等小学校为三年制。

在准备投考高等小学校时,由于父亲作为大家庭的“顶梁柱”需要权衡多名孩子的求学费,而当时家里达不到这些条件,所以并未答应先生的求学要求。他因此哭闹了一天一夜还不肯停止,到第二天早上,祖父听到哭声,得知原因后颇为赞赏先生的求学心切,就对他讲,你可以准备去考试,如能考上,由我做主,让你到县里上学。先生没有辜负祖父的期望,如愿进入中学。

由此可以看出,先生一方面喜好读书,聪慧有加;另一方面因为娇养,性格执拗,会非常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想法。在他少年时,家中积蓄一些钱,买进几十亩地,并将一部分种植西瓜。先生喜食,且无节制,造成消化功能紊乱,从此一直不想再吃西瓜。刘脩业说,“直到他中年以至老年,天气炎热时,一家人聚食西瓜,他从不染指。由此事,可以窥见他在童年时任性之一斑”。

1917年1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10],主张以白话文替代文言文;1917年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11],反对充斥封建思想的八股文;1918年5月,鲁迅发表《狂人日记》^[12],是一颗投向封建礼教的炮弹。李鸿章所言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此时还在进行中,新文化运动更是将之推向了高潮。刘脩业称:“这个时期正是世界思想革命,在中国则是社会大变革时期,封建制度已在垂死挣扎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正在传播。重民离开偏僻落后的农村,渐渐开扩了自己的眼界,他也读到了一些关于鼓吹救国救民的文章,激起了他的爱国图强的情感。但因他只在小学读书,这时又是在五四运动的前夕,他没有机会读到当时许多进步刊物所宣传的反帝反封建文字,所以他的思想还没发生较大的变化”。

1919年6月,先生从高阳县县立高等小学毕业,决定投考保定直隶省立第六中学,第一次离家到保定考试。1919年7月5日,保定省立第六中学发榜公布考试结果,先生名列前茅,刘脩业手稿中还有

一种说法为成绩名列第一,取得入学资格。

4 青年王重民

1919年8月20日,先生进入保定省立第六中学读书,1923年夏天毕业。这段时期,他不仅刻苦读书,同时也是顺应时代思潮的新文化青年,一个有着强烈爱国热忱且付诸行动的革命者和诸多传统文化的反叛者,这是很多年轻人所经历的青涩且又绽放的阶段。

最能够展现中学阶段的记录是先生在中学毕业前的1923年4月25日所写的《最后一课》,刊登在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学生杂志》^①1924年第11卷第5期。据笔者统计,他于1924~1926年在《学生杂志》发表了9篇文章,均以王鉴为名(其中一篇作者为“玉鉴”,疑为笔误所致)。这段时期主要集中在北京师范大学的预科阶段,既是他中学阶段的延续,也是他迈入学术之门的前奏。文章均为杂文,并非学术论文,但特点鲜明,针砭时弊,有很强的反叛性,这明显受到当时新文化运动、新思潮的影响。对于一个贫苦家庭的年轻人来说,先生既可以通过这些文章得到微薄稿酬或者商务印书馆的购书券,又可以表达自己对于现实的观点。

本章节并不重点着墨于文章发表的大学时期,而是通过这些文章介绍先生中学四年的经历及其思想变化。

他在《最后一课》中,将中学阶段分为了两个时期,以1922年3月13日为界。前一段为无聊期,后一段为兴趣培养期^[13]。笔者结合他的多篇文章和刘脩业的手稿记录,将这四年中学生活划为四个特点分述如下:

4.1 懵懂青年

像所有从县城进入省城的年轻人一样,一切都是新鲜的。中学是有楼房的,窗户是玻璃的,接触的

① 《学生杂志》一般不付现金稿酬,只送书券,用书券可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图书。据《全国报刊索引》对于《学生杂志》的简介可知:1921年,为顺应“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潮流,商务印书馆聘请杨贤江出任《学生杂志》主编。他到任后即对杂志进行了改革。他任职六年,为杂志撰写了大量社评,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他还发表了许多教育专论,深受读者欢迎。此外,他还开辟“通讯”与“问答”专栏,亲自解答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涉及思想、政治、读书、工作及生活等各个方面,为大多数学生所喜爱。在他的努力下,《学生杂志》在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等方面均堪称全国学生杂志之冠。



学生也有了很大不同,但他的思想并没有大的变化,人云亦云,这段懵懂时期被先生称为无聊期。且奉父母之命,在第一学期结束后与任丘县邸巧成婚,并于1921年10月1日生下长子王化一。中学初期,他既没有听说过胡适和陈独秀倡导的文学革命,也不晓得杜威博士来华访问讲学。“今日的日记,用之来日未尝不可,用之以后多少日子亦可;若把事情印出,空着日月,每日只填上日月阴晴便行了”。直到一年级暑假直皖战争爆发,他要知道为什么开战,以免被人轻视,所以开始阅读报纸。自此,他喜欢上了报纸的时评和新闻报道。另外,他买了一部育文书局出版的不完整的梁启超《饮冰室文集》,自言看书的兴趣是从这部书培养起来的。当时的他应该不会想到在几年后的大学阶段参与了梁启超所策划的《中国图书大辞典》编写工作,甚至还到任公的天津住所拜访^[14]。

4.2 文学青年

“雨后的春天,清凉的微风刮着,如丝如棉的白云在空中飞着,太阳光明的可爱光线,时隐时现,好像被我们欢迎,有不惬意似的。孱弱的我,拿本杂志,立在窗前呆着,自己也不知道是阅杂志呢,还是欢迎太阳照耀的春日呢”。

这是《最后一课》的开篇一段,透着浓浓的文学色彩,也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文艺气息。在《学生杂志》发表此文的下一期,他通过《中学毕业生升学问题的研究》一文^[15]表达了学生切不可专被文艺所迷的观点,“‘光啊花啊爱啊’的文艺,是带有麻醉性的”,以表达虽然文艺在课外自修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但不能醉心其中。年轻的他知道中学生的学校功课和升学考试最为重要。

1922年4月16日,直奉战起,保定戒严,先生请假回家。在这个不正常的假期中,他细心看了一部《杜威五大演讲》,两种达尔文的《进化论》和一部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自此,进化的观念深深影响了他,克鲁泡特金将互助论作为进化的一种因素,主张进化的重要因素是合作而不是竞争。这使得他坚定地成立之前有过意向的文学研究会。虽然此研究会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但他并不为此所左右。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吸收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新思潮、新知识,像偿还欠债一样来学习它们。他认为这是学习兴趣培养的原动力。看书阅报“像发生恋爱似的,一日不见,便不舒服”!

4.3 叛逆青年

在中学最后一年和大学预科初期,也就是王鉴时期,先生的思想具有很鲜明的反叛意识。一方面是来自家庭的影响,另一方面来自新文化运动的感染。其时,他的父亲希望他考入两、三年毕业的官办学校早点出来挣钱,作为长子长孙担起家庭的重担。他在《谈话:我的生活态度》^[16]一文中抱怨道:“我以往的二十年的生活,差不多无时不是生活在狂风暴雨里,无时不挣扎在烦恼,悲哀……里,更无时不希望得一盏明灯”,“每个细胞都是用悲哀和烦恼组成的啊”!当他没有得到父亲同意报考北京大学落榜后,他绝望了,把此次挫折认定是印象最深的人生苦难。因之前被算过没有求学的命,他真的相信命运说了。这时的他自怨自艾,想还不如去官府谋一个差事,“换几个昧心钱,穿上几件华美的衣服,去夸耀于邻里乡党”,同时又“若疯若狂”地呐喊,“希望是个骗子,新文化,新思想是个拐子”。他就像是一个人在黑暗中握着没有电池的探路灯一样,等待戈多的出现。

在他被称为拐子的新思潮影响下,更加剧了他对于传统的反叛。家庭给他的包办婚姻也是他反抗旧传统的原因之一,刘脩业说:“他读到《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其中讨论反对封建的父母包办婚姻,男女可自由恋爱等文字,他才意识到他当时的结婚是在封建制度下的牺牲品”。在大学时代,他还专门写了一篇《论我国古代的再嫁与离婚》一文^[17],旁征博引,挞伐这种不近人情的“夫死不嫁”“妇无二适之文”礼教风俗并非古已有之,而是“理学之毒,遗祸于后世罢了”。文章一方面为妇女鸣冤,更是通过学术的考据释放自己的压抑。他的包办婚姻造成的生活痛苦伴随他此后多年,因父亲不同意他离婚,直接影响到他大学时的一段感情,加之经常熬夜读书,他患上了失眠症。即使在他1932年离婚后,这种影响一直都存在着。

胡适等人的白话文运动也深深地影响着他。他用白话文写文章及写信,家书上只写“父亲”“母亲”,不用当时旧式所称的“大人膝下敬禀者”“禀跪”等敬语。到寒假回家,向长辈拜年时,改用鞠躬代替跪拜的习俗。在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农村,他的做法对于长辈来说是忤逆的。刘脩业据先生的侄儿王企贤回忆,先生在1923年(另有一处写为1921年^①)还写了

① 在笔者所查看的刘脩业手稿中,既有草稿,也有誊抄过的版本,内容有前后不一致的情形。



一篇《论孝》的文章,在上海杂志上发表。文中反对封建的“愚孝”,主张父子平等,但父母抚养子女确非易事,故为人子亦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刘脩业评论说:“在当时还是封建思想浓厚时代,由现代看来还有现实意义”。这与1919年鲁迅所写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观点有相似之处。经过我查询《全国报刊索引》,发现有一篇发表在《清心钟》1925年第三卷第7/8期,作者为王千鑫的《论“孝”》的文章最有可能是其所写,且千和鑫两个字的韦氏拼音均为“Chien”。文章立意鲜明,和刘脩业所说的意思相近。作者说孝是有存在的价值,但要回到孔子时代“原来的孝”,不能把孝作为一切做人之道^[18]。笔者不敢定论为先生所作,因文章发表时儿子王化一已经五岁,而文中却提到“我还没有做过父亲”。如果按另一处所写是1921年的文章,则有可能还未做父亲,因儿子王化一为1921年10月1日出生。

在《论眼光》一文中^[19],他将年轻人的知识储备不足看成是近视的人,把被传统的旧观念所束缚的脱离时代而开倒车的老人看成是远视的人。如何矫正视力(眼光),他认为需要“戴上时代思潮的镜子”。旧的社会秩序依然牢固,新的文化也开始登堂入室,父子二人对于政治、伦理和文化的隔阂是民国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面临的普遍情形,大家庭不再支持他上学的花费,他开始反抗,这时的他与巴金激流三部曲下的觉新有相似之处。

即使家庭不同意他到北京上大学,且不为他付大学学费,先生依然没有屈服,他半工半读,得以完成学业。他利用课余写文章,赚取微薄稿酬,还为《益世报》校对和做家庭教师来维持生计。到后期,在图书馆兼职工作。特别是袁同礼在北京师范大学授课时,见他困难,让他到北海图书馆做工以维持生计。成就他跻身学术大家的欧美访书十余年经历也是袁同礼直接促成,袁氏可谓是先生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提携人。

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他认为没有真正的修养,这些都是奢谈,“我们要做主义的利用者,不做主义的奴隶;要做问题的研究者和实行者,不要多谈问题”,这些思想明显受到了胡适1919年在《每周评论》上《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影响。对于白话文革命,他持接受态度,同样受到胡适等新文化运动学者的影响。他在升入大学预科后不久撰文《与一些朋友们谈谈国文》^[20],对中学的

国文教育大加挞伐,对老派学者推崇的国故也是不屑,“对于这些废物,说多了反足污秽,扰乱我们青年的思想”,“什么今文经古文经咧,什么汉学宋学咧,什么阳湖诗、桐城文咧,不过是没事找事罢了。数千年来,请问他们给社会人生,有什么贡献?曾造什么幸福?”他认为虽然国故是有毒的,但也有些菁华于其中,所以也要从中去淘取古人真的人生。“假能有部完全的中国文化史,即便再出个秦始皇把这些东西完全付一炬,我觉得只有痛快没有可惜!”他对于怎么读国文,极其鲜明地作了如下的表述:“先读现代的白话文——包涵着现代思潮的白话文,次读现代学者从国故中淘取出的真的国学,再次进而参考国故学的原文”。这显示出他对于学者整理国故的期盼。

这种反叛的态度更源于当时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对于受新思潮影响的年轻人来说,只有用更加激进的语言才能唤醒那些抱残守缺的人。据说,连严复这种非常稳健温和的学者在翻译《天演论》时,也常常说“尊民叛君,尊今叛古”这八个字^[21]。彼时,他还未真正踏入学术大门,但却已流露出后来他所推崇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研究方法。

4.4 革命青年

据刘脩业手稿,1922年3月11日,经好友杨景山介绍,先生在北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回保定后,拟在第六中学筹备成立团支部。但因邮寄的文件被直系军阀曹锟部下所查,下令通缉,并到学校逮捕他。当时校长周镐川是先生的同乡,又有亲戚关系。所以,校长在事先得知消息后,便私下通知他,并且在学校花名册上加注了他被开除学籍的日期,表明此学生早已开除,并不知下落。故他潜逃至保定附近的满城抱阳山暂避。

这个日期与先生在《最后一课》中的表述并不一致,他在文中谈到1922年3月13日收到一封信,自言这是他中学时代的分割线。在这封落款为新朋友安的信中,提到展封去信要介绍他加入社会问题研究会,以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精神去改造社会和家庭,但信与简章都被警署扣留了,并且要缉拿他,所以他往满城游了几天抱阳山和眺山。

经过查阅日历,发现《最后一课》中的日期13日应为刘脩业所写的11日,因先生在文中称“明日是礼拜”,而11日为周六,故得此结论。因为此信,他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新思潮产生了很强的求知心



理,所以他把这个日子认定为中学阶段的转折。据刘脩业推测,展封即为杨景山。

在中学时代,杨景山是影响先生最重要的人物。杨景山,1903年生,河北高阳人,与王重民、王锡疆并称为“高阳三杰”。他于1916年和王重民同时考入高阳县县立高等小学,后又同时考入保定直隶省立第六中学。

虽然刘脩业在手稿中认为先生在高等小学校时(1916~1919年)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但他的思想并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化,却有文章显示在五四运动爆发后,王重民和杨景山、王锡疆带领同学走上街头,示威游行,提倡国货,反对日货^[22]。

进入中学后,先生业余喜读《新青年》《新潮》《努力周报》等进步刊物。因受新文化运动和苏联十月革命影响,王重民和邓仲强、杨景山一起成立了学习马列主义书刊的“努力读书会”,提出“仅随主义走,不随任何人走”的口号。杨景山自己出钱买书,大家共同研读。还与保定高级中学、女二师等校的书报贩卖部进行书刊传播和交流。邀请读书会以外的同学参加报告会、辩论会,共同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和自然科学知识。

彼时的“高阳三杰”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造社会,抱负国家,他们共同的心愿是考上新文化运动的重镇北京大学。杨景山和王锡疆如愿进入北京大学,王锡疆成了李大钊的助手。经王锡疆介绍,杨景山认识了李大钊,并于1925年1月接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北京市委书记。

由于先生落榜北京大学,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所以他们之间的联系没有中学时密切。但受杨景山和王锡疆的影响,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和意气相投的同学,如杨秀峰、张苏、张友渔等发起组织一个新燕社,名义上是读书会,实际上是个进步组织,他们原想创办一种小刊物,但当时情形下,活动并没有如愿开展。针对从事社会活动致学业荒废的说法,他不以为然,认为功课糟糕的同学是整日悠哉的乐天派和运动员,而从事社会活动的学生则是活动之外是学习,学习之外是活动^[23]。这种认识明显受到蔡元培“学术救国”“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影响^①。

不幸的是,杨景山于1927年4月28日和李大钊等其他19位革命者被军阀所害。先生得知此消息后,悲痛万分,后来和刘脩业多次提到杨景山对他

的影响以及他对其的感情。刘脩业说杨景山的被害,

“给有三很大的打击,他曾一度陷入苦闷、迷惘、彷徨之中。他只好更努力埋头于故纸堆中,以寄托他热爱祖国之心情。但他一生始终念念不忘这惨痛的回忆,我们结婚后,他不时述及。到全国解放后,杨景山遗孀和一个女儿还住在北京,他和我常去慰问她们,并为杨景山烈士写文叙述其牺牲经过,请当时妇联负责人刘清杨同志作证明,为杨景山遗属申请得抚恤金。以后由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还在保定烈士陵园建立一座纪念杨景山的纪念碑”^[24]。

彼时的王重民在众多学术名家的指导下潜心学术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已经完成《老子考》的撰写。杨景山的悲剧,更加坚定了他自此不问政治,不谈主义了。刘脩业晚年致马蹄疾的一封信中,曾提及王重民的朋友曾对他说过《老子考》救了王重民的命这样的话。1928年北伐成功后,国民党要求党员重新登记。有朋友劝他去登记,否则要被捕,他说“逮捕是他们的事,反正我不去登记”,他已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失望。刘脩业说,“从此他不问政治”了。彼时,王鉴退场,王重民在学术舞台登台亮相。

白话文、新文化运动、新思潮的涌现,转考北京师范大学的成功,向身处烦恼的青年王重民打开了一扇窗。他慢慢对于过去的失望不再纠结,转而把握眼前时光来打造以后的光明前景,用他的话讲,便是“乐观的刹那主义”^[25]。虽然他对于当时的社会有诸多不满,认为这是一个麻木社会,糟糕国家,但是也相信年轻人的大敌不是不好的环境,而是没有奋斗的真精神。更加幸运的是,他遇到了袁同礼、陈垣、高步瀛、杨树达、傅增湘、梁启超、黎锦熙、钱玄同、吴承仕、黄文弼等学者。他修正了以前的想法,潜心于故纸堆中。这时的王重民对于读书的态度已不仅是中学时的那种“一日不见,便不舒服”的初恋感受,更是如“鲸之吸水,巨饮狂吞”的热恋体验。

年少形成的倔强甚至执拗的性格,加之他遍访中国古代典籍,被先哲大儒的精神所影响,形成了他刚正不阿、不慕权贵的处事方式。先生晚年之大悲剧也因之而起,实为家之不幸,学之不幸,国之不幸。

① 1919年夏,全国学联会长、北京大学学生段锡朋在杭州城见到蔡元培,蔡元培对段说单靠爱国的感情是不够的,必须秉此感情以求理智的发展,“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参见《中央日报》(重庆)1940年3月24日第四版刊出的段锡朋《回忆》。



先生尝言古人愿走万里路,读万卷书,我愿读万种书^[26]。他不仅读了万种书,还走了万里路,足迹遍及法、英、意、德、美等国家,致力于中国古籍善本的整理与研究,终成一代百科全书般的学术巨擘。

参考文献

- 1 关永礼. 功巨用弘 尽瘁公藏——近代图书馆学三大家[J]. 书屋, 2018(1): 4-9.
- 2 傅振伦. 王重民别传[M]. //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编辑部编. 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一辑).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2: 7.
- 3 崔文印. 王重民传略[J]. 晋阳学刊, 1983(1): 103-109.
- 4 李墨. 王重民年谱[D]. 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8.
- 5 王媛. 《王重民教授著述目录》补遗[J]. 图书情报工作, 2003(5): 20-25, 58.
- 6 艾俊川. 刘脩业先生致友人书信十一通[M]. //沈乃文主编. 版本目录学研究(第五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55-63.
- 7 特别记事: 临时教育会议日记[J]. 教育杂志, 1912, 4(6): 1-16.
- 8 法令: 教育部公布改正小学校名称令[J]. 教育杂志, 1912, 4(9): 28.
- 9 法令: 教育部公布小学校令[J]. 教育杂志, 1912, 4(8): 15-21.
- 10 胡适. 文学改良刍议[J]. 新青年, 1917, 2(5): 26-36.
- 11 陈独秀. 文学革命论[J]. 新青年, 1917, 2(6): 6-9.
- 12 鲁迅. 狂人日记[J]. 新青年, 1918, 4(5): 52-62.
- 13 王鉴. 最后一课[J]. 学生杂志, 1924, 11(5): 59-63.
- 14 丁文江, 赵丰田. 梁启超年谱长编[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1171.
- 15 王鉴. 讨论升学问题: 中学毕业生升学问题的研究[J]. 学生杂志, 1924, 11, (6): 14-18.
- 16 谈话: 我的生活态度[J]. 学生杂志, 1924, 11(3): 142-144.
- 17 王重民. 论我国古代的再嫁与离婚[J]. 妇女, 1927, 13(5): 1-4.
- 18 王千鑫. 论“孝”[J]. 清心钟, 1925, 3(7/8): 19-26.
- 19 王鉴. 论眼光[J]. 学生杂志, 1926, 13(12): 23-24.
- 20 王鉴. 与一些朋友们谈谈国文[J]. 学生杂志, 1924, 11(12): 54-58.
- 21 余英时. 重寻胡适历程[M]. 台北: 联经出版公司, 2014: 228.
- 22 李艳君. 学沃中华献青春[J]. 党史博采, 1998(7): 27-29.
- 23 王鉴. 讨论升学问题: 中学毕业生升学问题的研究[J]. 学生杂志, 1924, 11, (6): 14-18.
- 24 刘脩业. 王重民教授生平及学术活动编年[M]. //王重民. 冷庐文藪.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886.
- 25 谈话: 我的生活态度[J]. 学生杂志, 1924, 11(3): 142-144.
- 26 傅振伦. 王重民别传[M]. //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编辑部编. 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一辑).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2: 8.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北京, 100871

收稿日期: 2018年11月2日

Mr. Wang Zhongmin's Experience before Studying in th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Gu Xiaoguang

Abstract: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brief history of Mr. Wang Zhongmin's family and his experiences in the childhood and teenagerhood period, as well as having an influence on the academic research. It specially revises his original name and introduces and analyzes the four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eriod of the middle school.

Keywords: Wang Zhongmin; Wang Jian; New Culture Movement

(接第 73 页)

A New Mode of Reading Promotion: Planning and Design of Reading Park

Xiong Jing Zhao Xiao

Abstract: Reading Park, as an emerging urban cultural theme park, is an inevitable outcome of national reading promotion. Reading park has multiple functions such as the sign of reading city, a platform to display traditional cultural and a civic activity space. Content planning and theme designing are the key factors of reading park. This article takes content planning for Lake Songshan Gully Reading Park in Dongguan for example to introduce the method of content planning of a reading park.

Keywords: Reading Park; Reading Promotion; Content Planning; Gully Reading Park